



邓文迪 最佳“护夫品”

19日,英国议会就《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举行听证会,一名抗议者突然出现在会场,企图将一个装满剃须膏的盘子扣在传媒大亨默多克脸上。正当众人惊愕之时,默多克身后的一个粉衣女子飞身前扑,左手抓住袭击者的手腕,右手使出排球扣杀动作,利落地向袭击者的脑门劈去。这个女人,不是默多克的贴身保镖,而是他的第三任妻子邓文迪。

袭击者马布尔斯可能完全被这个华裔女人的一记重扣吓蒙了,以至于来不及施行预先制定的周密计划,最终只能仓促地对默多克喊出一句“无良的亿万富翁”。事实上,这个前女排队员奋力护夫的举动,不仅吓到了马布尔斯,同样“吓”到了海外媒体——“虎妻”邓文迪的彪悍和霸气,与他们眼中传统中国女性的柔弱形象截然不同。

或许邓文迪和默多克都应该感谢马布尔斯,他的袭击在客观效果上帮了这对夫妇一个大忙。此前,邓文迪形象颇为负面,一度被视为掘金娘子以及破坏默多克家庭的第三者,此番掌掴马布尔斯,正好帮她树立了捍卫家庭的正面形象;而默多克作为一个年过八旬的前癌症患者,遇袭事件反倒让他赚取观众同情,暂时摆脱了不利的舆论情势,连公司股价也大涨6%。至此,一场全球瞩目的严肃听证会,仿佛成了一出精心排演的戏剧。

当然,谈起邓文迪,江湖上流传最多的是她与默多克如何相识的故事。最具传奇色彩版本是这样的:邓文迪闯进默多克参加的一个晚宴,故意将红酒洒在了他的膝盖上;另一个版本是:1996年,邓文迪从耶鲁大学毕业后飞往香港,恰好坐在新闻集团董事Bruce Churchill旁边,飞机还没有到香港,她就已轻而易举地谋到了卫星电视公司总部的实习资格,随后结识默多克并走入婚姻殿堂。

传说终究是传说,对国内的男同胞来说,在电视直播中看到“虎妻”邓文迪的骁勇和威武,最大的感触可能是明确了好媳妇的新标准:谁给我一嘴巴,我媳妇就给谁一嘴巴。



姚明 换个场地

7月20日,上海浦东嘉里酒店,篮球巨星姚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一个艰难的决定”:结束自己的运动生涯,正式从休斯敦火箭队退役。这个左脚里嵌着一斤钢板钢钉的男人,毅然脱下NBA球衣,以西装革履的崭新形象闪亮登场。不过,一切都如他所说,一扇门已经关上,另一扇门正徐徐打开,这位2米26的中锋只不过是换了一块场地。

从2002年以史上首个外籍状元秀的身份登陆NBA,到2011年骤然伤退,整整9年时间,姚明完美地实现了从球员到球星的全过程进阶。球迷们一定会记住这样一组数据:8次入选全明星阵容,486场常规赛,9247分,4496个篮板球,769次助攻,189个抢断,920次盖帽,投篮命中率52.4%。这些留给NBA的数字,足以让他在体育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姚明被国外媒体喻为“移动的中国长城”,并频频被视为中国文化的醒目符号,但他本质上却是美国制造的一个中国形象。虽然也曾经受惠于举国体制的培养,但与其他“国产”运动员相比,姚明身上并没有特别浓厚的体制色彩。驰骋赛场的他,更像是一个专注享受篮球的人,而不是以夺冠和争取荣誉为目的的比赛机器。

记得有人评判中国海外形象宣传策略时曾说过:中国政府斥巨资在纽约时报广场投放大屏幕广告效果不佳,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识那些广告片中的“民族英雄”,他们真正熟悉的只有姚明。在他之后,中国或许很难再找到一个像他这样的体育明星,能够以强大的气场支撑数亿人的期待。

这是告别的时节,却不必太过感伤。毕竟,深谙经营之道的“姚之队”已经为他找好了“新场地”,从他接手上海男篮俱乐部、频频出手投资和参与慈善活动,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端倪——“球星姚明”已成往事,“商人姚明”正阔步走来。



夏元福 邻家“活雷锋”

21日凌晨4时许,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栋6层居民楼突然坍塌。事后,哈尔滨电视台主持人王铮发布了一条广为流传的微博:“刚刚电话慰问了朋友,他很庆幸捡回了一条命,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他还想着别人,挽救了30多人的性命,我为他骄傲!这功德是很大的,他是我们哈尔滨当之无愧的英雄!”他说的“朋友”,名叫夏元福。

36岁的夏元福曾经当过兵,现在开着一家礼仪公司。如果没有他,这起发生在凌晨的坍塌事故,不可能创造零伤亡的奇迹。事发当夜,夏元福被屋里的异常响动惊醒,随后发现墙壁上出现裂痕,天花板上的墙皮也哗哗往下掉,他预感到房屋即将垮塌。在赶紧叫醒身边熟睡的老婆之后,他顾不上穿衣服就赶紧一边向楼下跑一边大喊,楼下的很多居民正是被他的喊声叫醒,才及时逃出房间。

当然,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我们也要把同样的敬意献给住在那栋楼的另一位“好邻居”——刘继连。在发现楼房即将垮塌的迹象之后,他和夏元福一样,并非只顾自己逃生,而是挨家挨户地敲门把邻居们叫醒。在通知邻居们撤离的过程中,刘继连手脚并用地踢门叫人,把脚都踢肿了;而夏元福一边砸门一边大喊,嗓子都喊哑了。所幸的是,他们的付出没有白费,在所有人逃出危楼后不到3分钟时间,楼房轰然倒塌。

无论是夏元福还是刘继连,他们都很普通,一如我们身边平凡的邻居。但在危急时刻,出于一种朴素的邻里情谊,他们仍能挂念着邻居们的安危,这样的觉悟让我们肃然起敬。塌楼的原因正在调查之中,但和某些热衷于煽情的主持人相比,挺立在这片废墟之上的夏元福和刘继连,或许才是真正的“脊梁”。



赛锐 第二个李昌奎

李昌奎奸杀少女案改判死缓的争议未消,又一份改判死缓的终审判决书近日引发舆论强烈关注。该判决书显示,2008年6月,云南昭通男子赛锐因求爱未果,将当时在昭通卫生学校念书的21岁女孩吴倩捅27刀,几近斩首。赛锐一审被判处死刑,但云南省高院终审改判死缓,理由是凶手有自首情节,且案件系“感情纠纷、矛盾激化而引发”。

李昌奎案和赛锐案都发生在云南,案中部分情节恶劣程度相当,且同样都是一审判处死刑而二审被云南高院以“有自首情节”为由改判死缓。如此多的“雷同”情节,无法不让公众怀疑赛锐将成为“第二个李昌奎”。甚至有人提出质疑,这两起案件改判可能有参照嫌疑。

此前,云南高院副院长田成有就李昌奎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社会需要更理智一些,“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这是对法律的玷污”。田副院长还强调,“我们不会因为大家都喊杀,而轻易草率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这些辩解,都遭到网友猛烈拍砖,以至于云南高院至今都拒绝对赛锐案作出表态。

从李昌奎案到赛锐案,司法判决都与民意出现了严重背离,相当数量的公众认为李昌奎和赛锐的血腥杀戮挑战了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底线,但法院却立志将这两起案件办成践行“少杀慎杀”理念的标杆。诚然,独立的司法不应受民意左右,但真正公正的司法岂会屡屡与民意背道而驰?在废除死刑尚存争议的前提下,某些地方跨越式地扩大“慎用死刑”的范围,难免会扰乱法治秩序,也难以洗清权力寻租的嫌疑,只会加剧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

诚如一些法学专家所言,赛锐案和李昌奎案,将量刑标准的模糊地带暴露在公众面前,围观者质疑两起案件对“死刑”改为“死缓”,以及对“自首与减刑”的争论,本质上是怀疑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司法判决受到了外力干预。坦白说,两起案件都不复杂,公众需要的不是“标杆”,而是一个公正的交代。



胡丽天 我不是托儿

64岁的成都老妇胡丽天,短短几天之内遭遇身份“大翻转”。先是某位作家在网上发帖称,在随机抽签的情况下,胡丽天7年间十多次被选中为听证代表,且多次支持政府涨价;随后,激愤的网友给她贴上“听证专业户”的标签;几天后,网友“猪头非”一篇名为《正说胡丽天》的博文针锋相对地站出来进行辟谣,使得舆论风头逆转。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胡丽天很可能真不是政府安排的托儿。虽然前前后后23次参加听证会,但她实际上报名超过40次,而被抽中为听证代表,往往都是因为报名人数太少。平地起波澜,但诚如胡丽天所说,她明白公众对她的指责都是指桑骂槐,槐树是对听证会制度的不满,而她就是那棵桑树。

如果你有耐心仔细研读关于胡丽天的所有报道,其实不难发现,参加听证会实际上更像是她的某种消遣,她从中得到的乐趣可能不比麻将象棋来得少。她记得自己参加的每场听证会的时间和地点,甚至记得每次穿的什么衣服;她舍得花费三个月的退休金,独自到北京参加交强险税率调整听证会;她会为更好地提问而学习使用电脑,在QQ群里征求大家的意见……当然,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这个退休老人所做的一切,都只为赚取每次200元的补助费。

“听证会”沦为“听涨价会”不是新鲜事,这骂名显然不该由胡丽天们来背负。一方面,绝大多数民众宁愿在网上“骂娘”,也不愿报名参加听证会,只能说明听证的公信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即便有胡丽天这样通过报名和抽签方式来到听证会现场的民意代表,他们也无力阻止地方政府的涨价冲动。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倒是比较尊重这样一位老人,她实际上向公众和政府提出了两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能像胡丽天一样报名参加听证会?听证会为什么不能吸引更多像胡丽天那样的人?

本版特约主持人

汤嘉琛

(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